出　版　说　明

罗瑞卿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长期担任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无私无畏，顽强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建设特别是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许多军事著作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

《罗瑞卿军事文选》是经中央军委批准，在总参谋部领导下编辑出版的。总参政治部组织协调编辑工作并对书稿进行了审核。军事科学院对书稿进行了审定。《罗瑞卿军事文选》收入了罗瑞卿同志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七八年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讲话、文电等八十篇，在纪念罗瑞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发行。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选入的文稿均保持原貌，只对部分文稿作了史实和文字上的订正，对讲话记录稿作了文字整理。为便于阅读，对文稿作了必要的题解和注释。文稿中字迹缺失和辨认不清的以“□”代替，因保密原因或不宜公开发表的数字、人名以“×”代替。

《罗瑞卿军事文选》编辑组

二○○六年二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雄关的战斗[*1]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个晴天的早晨，太阳刚刚升上东边的山顶，白色而寒冷的霜，渐渐被太阳的热气驱散了。一队队的红色健儿，荷着枪弹，正在向着大雄关[1]的敌人进攻。当我们刚刚登上了党口附近的大头山，即已发现敌人先我而占领了大雄关东南极有名的木鱼嶂、西山岭的险要高地，以当时的地势条件来说，我们是处在无法使用兵力，不能发扬火力的地位，兼之又要向着已占领险要阵地配有强烈火力的敌人实行仰攻，这当然给了我们战斗上的相当困难。然而工农的红军，他是苏维埃[2]的唯一捍卫者，为着消灭阶级的敌人，他是不顾一切的！

很短的时间内，司令部的命令下达了，我模范的五团[3]，是担任突击方向的前锋。当然，我们的部队在作战前曾经过了长时间的长途行军，许多部队连夜未睡觉，连餐未吃饭，即在作战那天，许多连上，还是前一天早晨吃过饭的。作战的前一天，我们是爬过了内外演溪几十里的大山呀！但在他们的行进中，只见着他们一个个的英勇、无畏、活泼、高兴的表情，只听着他们不断的“有味道”、“打响了”、“今天多捉几个师长去”……的声浪，却丝毫未听见任何疲劳、畏缩、不满的表现。这不是证明我

---

* 本文原载于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红星报》第十九期。罗瑞卿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

们不是自夸即是真的英勇无敌艰苦斗争的铁的红军么。

我们刚上阵地，敌人的飞机来了，敌人的猛烈火力，从三方面向我们交叉射击，正面的敌人，又对着我投掷集团的手榴弹。然而，我英勇的五团的一部，在司令部的前进号音中，一口气即冲上了木鱼嶂的敌人重要阵地，杀得敌人奔命逃跑！但是因为我军没有很好的火力配合，和后续部队没有同时赶上，致使敌人得以整理收容，并集合三倍于我的兵力向我反冲锋，结果被他夺回了原有阵地。我五团在更困难的情况下，又作第二次的冲锋，卒将顽强的敌人又击退了。然而终因为敌情地势的限制，以及我方火力配备、后续部队有缺点，以致这一战斗，没有最后的解决。

在这一战斗中，第二师肖桃明、张兴、谭顺发[4]等同志，因率队冲锋，而光荣的牺牲了！其余尚有部分我们最好的干部，以及共产党、团员，都为领导战争伤亡了。我五团一个指导员，光荣的牺牲于我冲锋部队的最前面，这些都是我们光荣的模范！

他们的牺牲，自然是我们革命的损失，然而他们的鲜血，却吓破了敌人的狗胆！更加激起了我们红色战士极度的杀敌勇气！

大雄关的战斗，未最后的解决，这是事实[5]。然而这种光荣的牺牲精神，是使我们永久不能忘记的！让我们高呼：

大雄关战斗的英勇精神万岁！

我们的光荣的牺牲战士万岁！

注 释

〔1〕 大雄关，位于江西南丰县、宜黄县交界地区。

〔2〕 苏维埃，是俄文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它所管辖的地区称为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

〔3〕 五团，属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建制，团长咸钦，政治委员刘忠。

⑷ 第二师，属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建制，师长吴皋群，政治委员胡阿林。肖桃明，当时任第四团团长。张兴，当时任第六团政治委员。

⑸ 大雄关战斗，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大雄关地区反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一次防御战斗。

红大[1]教育工作的一点经验*[1]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党及军委为了适应目前发展着的政治局势，为着适应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实现，为着适应于行将到来的大规模抗日战争发动后的需要，在红军胜利回师西渡[2]以后，创立了空前的大规模的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的能够忠实于党的路线，忠实于革命的事业，而且有单独工作能力，并能遵守纪律的干部。这是党的路线彻底实现的保证，是统一战线的成功与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此时学校的创办，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担负着严重的政治上、战略上的任务。

在上述的意义下面，所以党及军委对于此期学校是以最大的努力与决心，以极高的注意力，来注意入学的领导。这就是此期学校之所以不同于过去各期学校，之所以较之过去各期收获较丰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目前学校的学习时间，已过去一半，而且前方部队、地方党都在党的加强干部教育上、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把所有干部大大提高一步的正确的方针之下，而正努力于干部的教育。据我们所知道的，最近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不少的成绩。因此，我们把学校这个时期在教育上的一点经验写些出来，作为大家教育干部

---

* 本文原载于中共中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党的工作》第十七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罗瑞卿当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参考，同时即在学校本身，今后亦应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锻炼出成千成万的优良干部，分送到各个战线上去。

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学校经验的全部，而仅是一点比较重要的问题，自然也不是每一条都能适用于一切干部教育的工作中去，而还须同志们依据实际情况适当的采纳，同时我在这里所说的，也还是一些比较原则的问题。

第一，学校此期教育方针第一个重要的原则，便是在教育内容上、教材的选择上，都力求“少而精”。这个原则经过四个月教育过程的证明，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干部大多为工农出身，文化水平的不够（甚至很多还是文盲），他们虽有着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而政治上亦是极端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但他们的政治知识、理论水平的准备，却极端缺乏。同时，他们中大多数从来未经过有系统的学习过，思想亦缺乏系统化，因此就必须估计到他们对于教育的内容接受的能力是极端有限，同时在目前严重的斗争环境下，当亦不能让他们有很多的时间来学习。如果我们对于教育的选择，不能尽量求得减少，结果必因贪多而无所获。所教的虽多，而学员所得的却是一知半解，甚至于根本就不知不解，或错知错解。对于问题，不能深刻，即或接受一点，也就不能巩固，记着了这样便忘记了那样，或者当时强记了一点，而过些时候也就忘记了。这样学生恐还等不得出校门，即所学的大部还送了“先生”。这种教育自然会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功不及半，甚至不仅无功，而且有罪的结果。

然而教材的内容仅仅是少而不精，也是不行的。因为这样，虽然学得了，也还不能适应于干部们的实际需要，徒多懂得几个十分切实的政治上的名词，或军事上的术语而已！因此教材的内容不仅要少，而且要经一番选择的功夫，力求其精粹者。这样才会使所学所得，在实际上有用处，不然也会冤枉的花费时间与花费功夫的。但在这里应该指出的，在我们教育干部的现在环境之

下，教材的内容必定要先求其“少”，而后才能求其“精”，多则是不会“精”的。

因此，此期学校在实际的执行上，对于每一个教育的内容，使学生、教员都有这样一个观念，教的人必须教懂得，而学的人，亦必须学懂后，而后再教再学新的内容。这特别在二、三科[3]更着重如此做。对于教材，经过了详细的选择、讨论与审改，每个教材内容亦尽量删去其不必要的部分，规定出一定的时间，用以复习。这种不求多、不求快，而求深入、求巩固的办法，是此期教育收效较优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原则，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在前方的干部教育工作中也可以采用，而且更应该采用。因为前方的干部学习时间更有限，而他还要用很大的精力去顾及工作，其他条件都与学校的干部相同，过多的灌输，他们更加接受不下。

第二，理论与实际并重，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一原则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似乎又很普遍，每一个负责的干部似乎都懂得，“理论离开实际便是空理论，实际离开了理论的指导便是瞎实际”。这两句列宁的话，每一提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差不多很多人都会背诵，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是有不少例子，对于这个列宁的指示，离开得很远，或者并不懂得怎样去联系。即在学校的教育工作中，对于上述的原则，自然是没有争论的，然而在有一些实际的问题上，是经过斗争与争论才转变与克服了的，有些或正在转变的当中。例如：

1. 学校中党的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应该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与注意于党员中、学员群众中思想上意识上布尔什维克[4]的严格锻炼。这样不仅在军事上、政治理论上把干部提高一步，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亦把他们大大的提高一步，提高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程度。这两者之间自然并不是毫不相关的两个问题，然而学校中党的工作，必须如上述的提法，才能包括他主

要任务的全部。而学校一开始时，党的支部工作，只提出了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而对于后者没有能够与前者并重的明显的提出。因此，学校在一个时期中，支部的实际生活，即表现偏重于教育计划的保证（所谓教育计划是指学校训练部所拟定的军政教育实施计划），而忽略了党员中思想意识上布尔什维克的严格锻炼。所以党内的思想斗争表现不能正确的开展起来，支部对党员之思想意识上的检查表现忽略，党内所讨论的问题，大半都为一般学习方面的问题，很多与学习小组中所讨论的无二致，不了解有些人他在书本子上的学习成绩是很可以取得优胜的，他亦能够讲漂亮话，他亦能够背诵一些书本子上的词句，然而往往他的实际工作并不好，思想意识并不很正确，甚至往往是很坏的。

然而应该指出，学校的教育方针，在党及军委的领导下，一开始即注意了理论与实际并重，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上述的现象，经过学校负责首长的指出，再经过军委着重的指出以后，党的工作是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好的转变。

2. 表现于某些个别学员中，甚至在一、二科的学员中，在开始的时期，只埋头于书本子上的学习而忽略了实际生活的参加，与某些实际斗争问题的不注意。如个别同志对于党的《斗争》报，与《党的工作》报[5]都不及时来看或者很少看，甚至不看；对于某些临时分配的实际工作，或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学校一部分的工作，好几个同志都借口有碍学习不愿参加。不了解这些也是学习，不了解我们所学的原则，便是为了要能够回答实际问题，而在理论的学习中，能够参加一些实际生活，将是更好的学习。这种现象自然也是与上述原则相违背的，因此，学校方面亦特别注意了此种现象的及时纠正。

3. 此期学校特别注意于好的校风的养成——紧张、活泼、严肃的校风的养成，就是说要在学校中造成工作紧张、生活活泼、纪律严肃的好的作风。因此学校方面对于日常生活、内务礼

节、制式教练的严格要求，执行命令的严格要求，注意于列宁室[6]工作的真正建立……这就是为了养成这种好的校风的具体方法。我们不仅要在军事上与政治上把干部提高，亦要在思想意识上给以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的锻炼，而且也应该在实际的生活中，养成他们要有好的工作作风与能遵守纪律的干部，把这种作风带回部队中去，实现学校好的校风对于红军部队领导的作用。

第三，关于教学的方法问题，要使每一个教育的内容，能够深入，能够巩固，要使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教授与学习的方法，亦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没有好的教学方法，要求教育深入与巩固，与每一原则问题的真正了解，是不可能的。譬如说，在教授的时候，在抽出每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引实际生活中的例子作喻，应多举浅近的实际例子来引证原则。在日常工作中与党的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应引导学生们回忆到原则上去，把实际的问题提到原则上去解决。在学生们的学习、讨论中，应多以今天的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拿来与原则问题联系着研究。这样才能使学生活泼的了解原则，才能应用原则，才不致于把活的原则了解成为死的教条。

然而学校的教学方法，在一个时期中却未能够这样做，而且表现着浓厚的条文主义与公式主义，学员们去死记每一个问题的条文，不去求得问题的真正了解，甚至有个别教员不仅不去引导学生真正的活动的了解原则，反而故意去迎合学生这种不正确的心理，因此在学校的一、二科中曾经发生过下述的一些怪现象，例如：

凡讲授每一个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本身怎样，都一定要求一个一条一条的提纲，这一提纲，一定分做几个大点，而每个大点之下又必须要有几个小点，这样才算好的提纲。每一问题讲完后，又要求一个所谓“简单扼要”的结论，这种结论又必须大点之下有小点。我们并不是反对每一课目都应有讲授提纲与讲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的结论，也并不是一味反对把问题适当的清楚的分成项目，而是反对那种只着重于条文字句的机械记忆。很多人都去死记着这些条文，因此在学习组的讨论会中把条文重复背诵一次，在测验时也一定要是书本子上即能背诵得出来，个别教员也去满意于这样的测验成绩。在第一科的第一队曾经有学生在准备测验时，专门的把问题的条文来背诵，忽然忘记了一条，他这样问另外一个同志："耶！这个问题的第二条是怎样的？"这个同志答……他说："你错了，这不是第三条吗？"有一次测验时曾经有过这样的题目，"现在世界上废除钵位[7]的国家有多少个？"这真是同前方剧社所表演的一幕滑稽戏——"老先生教书"，那个游学先生所问的牛身上有好多毛？天上有好多鸟？是一样的滑稽！

在二队有个学员对于帝国主义的五个特点背得烂熟，但是问他何谓资本输出、何谓垄断，则茫然不知所对，再问何谓托拉斯[8]，他答："托拉斯大概就是托洛茨基[9]吧？"问另外一个学生"入党的条件"，他答："凡是坚决于抗日的均可入党！"（在中央新的决议前）再问："陈济棠[10]现在说抗日亦可以吗？"他答："他要抗日亦可以。""蒋介石[11]如抗日怎样呢？"他却不能对了。

在第二科也有许多同样的情形，进行测验时，题目是照书上出则答复得较好，若把问题拆开来，或变换一下，往往就不能答出。某连调换一个政治教员，许多学生讲他不好，说他把问题讲错了。考其原因，据说原教员讲某问题时有四条，而他只讲三条（实际内容一样），岂不错了吗？某次演习遭遇战时，因为事先预定了地形，结果成绩尚好。以后变换一个地形演习，据说很多学生则不知如何处置。

好！够了罢！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说明教学方法的条文主义与公式主义，将会给我们以什么样的恶果！若不克服这种条文化公式化的倾向，我们所学所得，除了多记得几个死的词句，于实际

究有多大用处呢？

学校对于这种倾向，曾经经过斗争，经过不止一次的指出，可以说，现在在许多方面是已经改变了的，当然还有未肃清的残余，我们必须为着彻底肃清这种倾向而努力！

第四，文化教育，我们认为这也是干部教育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应当把他看成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应当把他看成是干部学习的必须工具。应当看成为干部工作中的必须工具，就是说，干部如有了相当的文化程度，不仅工作上感受许多便利，就对他们学习上，亦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红军中的工农干部，由于文化程度给他们的限制，不仅使其工作上感受许多痛苦，而对于学习，对于政治水平的提高，也感受一些限制，因此也就限制了干部的进步和发展。此期学校对于文化教育，尤其识字教育，亦特别着重。在二科一、二队，现已专门规定时间学习作文。在二、三科，对于识字教育，都预定要达到一定的要求，特别注意识字教育的组织与检查，其他如算术、自然……亦计划给以必须的常识教育。数月来，在此工作上面，的确获得了一些很显然的成绩。现在二科一、二队，许多同志都提高到能看简单的讲义与做笔记；三科亦有很大的进步。以我们现有干部的条件看来，这一点无论在前方部队中，在地方党、地方机关中，在一切干部教育中，都应该重视。

这就是红校四个月来教育工作的一点经验。我们把他写出来，我想：不仅可供同志们在干部教育中的参考，而且就在学校本身，亦应该继续坚持这个党及军委与学校首长对于学校教育的正确方针，依据过去的经验，克服我们还存在的弱点与缺点，巩固与发扬我们已获得的成绩。并且我认为此期学校的一些好的经验，就在以后的学校，也应该继续与发扬。

让我们的红大，能够涌现出成千成万党的路线的最优良的干部罢！愿他们每一个都成为抗日战线上的民族英雄！

注 释

〔1〕 红大，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简称。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瑞卿等组成教育委员会，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

〔2〕 红军胜利回师西渡，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红军第一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山西军阀阎锡山调集晋绥军十四个旅，蒋介石增派八个师向红军反击，企图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红军为避免不利决战，并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遂于五月初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苏区。东征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

〔3〕 二、三科，红军大学设第一、二、三科，第一科也称高级科，主要训练师、团以上干部；第二科也称上级科，主要训练营、连干部；第三科也称普通科，主要训练大多为工农出身的班、排干部和老战士。

〔4〕 布尔什维克，俄文的音译，意思是多数派，是列宁建立的苏联共产党用过的称号，后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被称为布尔什维克。

〔5〕 《斗争》报与《党的工作》报，《斗争》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党的工作》是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油印刊物。

〔6〕 列宁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中的群众俱乐部组织，主要任务是协助连队政治指导员开展军事、政治、文化学习以及体育、文艺、壁报活动。

〔7〕 钵位，原文如此，可能指封建世袭制度的爵位名。

〔8〕 托拉斯，英文的音译，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之一。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9〕 托洛茨基，俄国工人运动中反对列宁主义政治派别的首领，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八年搜罗各国托派组成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与第三国际对抗，破坏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堕落成为国际性的反革命派。

〔10〕 陈济棠，广东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粤军）总司令、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剿赤军”南路总司令。一九三六年六月联合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反蒋的六一事变，宣布“北上抗日”，失败后于同年八月赴欧洲。

〔11〕 蒋介石，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抗大的过去与现在[*1]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

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在中国的西北角上，诞生了一个为着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而培养干部的学校——抗日军政大学[1]。今年的六月一日，正是这个学校值得纪念的日子——它自己诞生的两周年！

应当指出：这个抗日军政大学之产生与成长是与中国共产党之直接培养、抚育与领导不可分离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抗日军政大学。

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更加进一步的取得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同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经变成为全中国广大人民自己的要求与主张了。中国共产党为着把自己全部政策的转变贯彻于党的全体干部中，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以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也为着抗日战争发动后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因此，重新教育干部，把干部提高一步的问题，就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之上。我们的学校——“抗大”也就在适应这种客观情况的需要而产生了。尽管当时的内战[2]尚未终结，而这个学校在当时亦还因袭着在江西时代的“红军大

---

* 本文原载于中共中央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群众》周刊第六、七期合刊。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罗瑞卿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

学”[3]的名称，但它所采取的教育方针与教育内容，已经早随着共产党全部政策的转变而转变了的。

这个学校是带着军事性质的，因为它的目的主要的是为着教育与培养军队中的干部。不过，在开始的时期，它的政治教育的内容，却占据了整个教育内容的重要地位，因为当时他们感觉着在一定的时期内政治教育的重要，较之军事教育更为迫切。这就是说，他们教育的目的虽然是在培养军事干部，但是要培养出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头脑，而又要能够最好的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军事干部，因此，他们特别强调了这个政治教育的内容。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异常正确的。

第一期的学生都是从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军队中征调出来的，人数仅仅不超过三百。然而，这都是经过了共产党的长期培养，长期锻炼所涌现出来的那些艰苦卓绝、身经百战的、最优秀的干部，他们中间有好几个是在内战时候的军长、师长，甚至负过更高责任的干部[4]。他们有着很丰富的战斗经验与工作经验。他们其中有许多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学校第一期的物质上的苦况，那是很令人难于想象的。他们没有必需的校舍，只有经过学生自己的劳动所修补起来的几个破石窑；他们没有任何校具的设置，几块破砖所凑成的四方形的台子，便是学生们在讲堂上听讲的座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用作笔记唯一的活动书桌了。必需的教育用品、教材、教员等，都贫乏得不堪言状，全校只有三个教员[5]，而且，一切其他的学校负责人亦异常缺乏教育工作的经验……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受着很大的困难。有一个当时参观我们学校的外国记者对我说：“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学校。”自然，这是他对于我们的过誉之词，但仅就上面那几种情形说来，我们却真可以当之无愧。

然而，我们是否就为上述的困难所屈服呢？不！我们不是那

样怯懦无能的分子。虽然由于我们缺乏工作上的经验，曾经经过了一个短的时间的摸索，然而经验正是从实际工作中去摸索起来的。我们依靠于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依靠于全体人员不怕困难的毅力与创造的天才，依靠于全体学生的高度的学习的积极性与自动性，我们很快的结束了那个摸索的阶段，而创立一套较为完善成熟的方针与方法。我们的教员困难吗？但我们却有了更好的教员，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他们抽出了不能抽出的时间，亲自来给我们教课，我们的第一期学生，可以说就是他们所亲自教养出来的。因此，我们第一期学校的成就，应当首先感谢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这些领袖们。仅就这一点说，我们第一期的学生可又太幸运了。要是我们不处在只有三个教员的苦况，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的际遇吧！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困难被“扫荡”了。我们学校的第一期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全体学生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他们的头脑，是更好的被军事、政治的理论所武装起来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由于理论上的灌输，与许多实际生活上的锻炼，亦同样使他们有了更高的素养。因此，第一期中，学校是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创立了今后发展的坚强的基础。

双十二事变[6]爆发后，我们的两百多个干部毕业了，离开学校到实际工作中去了。他们不仅到八路军的部队中，而且也走向确立统一战线工作的各方面。应当指出：我们的第一期的学生，他们在争取国内和平，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忠于这个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政策以及组织对日抗战等等问题上，是尽了他们自己极大的努力与极大的责任。

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后，我们学校的名称即正式改为名副其实的抗日军政大学。这是正当着学校第二期的开始。我们的学校突然增大了，因为不仅要吸收刚被汇合起来的三个方面军[7]的将近一千多个自己军队中的干部，而且还要吸收来自全国各地的

几百个学生青年。这些外来的学生，他们都是非常纯洁可爱的青年，我们民族中一些最优秀最有为的子弟，他们有着最崇高的理想、最远大的志向，以及最坚毅的意志，他们为了献身于民族解放的事业，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与希望，来到这儿学习抗日的理论与方法，学习革命的传统与作风。对于这些纯洁、热情、有为，我们民族的优秀子弟，我们学校应当拒绝他们吗？当然是不应当的。我们应当张开两手来竭诚的欢迎他们。于是乎，我们三个教员、三百学生的学校，就一变而突然成为一千多个学生的学校了。

自然，由于国内和平的解决，整个政治形势的开展，比之学校第一期，当然给了我们更多的顺利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更加安定的来遂行我们这个实施国防教育、创造抗日干部的教育事业。然而，在新的发展中的新的困难也确实不少。延安时代的校舍，虽然较之保安宽敞得多了，但与整个人数比较起来，还是异常困难的。教育上的设备、校具、教育用品、教材以及军事、政治教员等更感无法应付。此外，还有许多新的困难，例如学生之程度的不一致，如何来巩固外来学生与军队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特别是经费困难得不可终日的状态，粮食的情形更坏，随时都感着断炊的威胁，即连很粗糙的杂粮如包谷、高粱之类，都经常弄得“上顿接不到下顿”，以及军队干部这一批学生文化程度之特别低落等等，这一些都使我们在执行自己教育计划的时候，随时都感到一些阻力与苦痛。

但是，我们也同样没有为这些困难所吓退，我们依靠了上述的那些条件，特别依靠了我们全体人员那种坚强不拔的毅力，我们就能够有了许多迎接困难的方法，结果我们仍然战胜了困难，而不是困难战胜了我们。我们仍然顺利的完成了第二期学校的任务，并提早完成了学校的教育计划。对于那几百个外来学生，更使我们获得意外的成绩。我们不仅在政治上使他们掌握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武器，军事上给了他们以必需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游击战术与政治工作的知识，而且，在思想上、意识上、行动上、生活上，也给了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与锻炼。经过几个月后，原来思想不健康的，后来也比较进步起来了，行动上的浪漫习气、工作上的不紧张、生活上的不能刻苦等等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后来也能够逐渐转变过来了。总之，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不仅使他们政治上、军事上获得了应有的进步，就是思想意识上、生活习惯上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某些弱点，也帮助他们来了一个洗涤与克服。尤其值得指出的：就是在学校的第二期中，由于它汇集了三个方面军的干部，所以它亦就汇合了三个军队十年来彼此优良的经验作风与传统，来普遍到全体的干部中，经过二期毕业的干部去更加增进三个军队的团结，加强整个军队的战斗力量，使之有益于民族解放的事业。这曾经起了很重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可宝贵的收获。此外，我们学校所要求的“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风[8]，在第二期工作中，亦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在确立我们的校风使之成为一种经常的普遍的良好作风的问题上，二期工作是给它打下了一个坚强的基础。

正因为我们有了以上的收获，所以，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进攻卢沟桥的炮声一响[9]，我们就能够有一千多个民族革命的战士立刻奔向抗日战争的前线。这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这就是我们给万恶的日本强盗的进攻一个最响亮的回答。

随着华北抗日战争的烽火，我们学校的第三期开学了。两千多个民族革命的健儿，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青年，也有来自抗日前线上的第八路军部队中的干部。他们都带着战斗的姿态，在战斗的环境中，来进行战斗的学习。他们学习的目的，仅仅就是为着当前的抗日民族革命的战争。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准备随时接受调赴前线的命令。我们第三期有不少的学生，到校不久，就因为战争的需要，不得不离开学校，而奔向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去

需要上本书的请 www.ertongbook.com